

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

在我看来,人们只有一视同仁地坚持要英国结束在印度不受欢迎的统治,才能去谴责发生在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的犯罪。我属于左派,因而必须在左派内部工作,尽管我十分憎恨俄罗斯的极权主义及其在我们国家的恶劣影响。(奥威尔:《致阿索尔女公爵》)

《动物农场》是奥威尔的代表作,现在已被译成六十多种文字,销量超过四千万册。出版前,他就担心,此书可能正中保守派的下怀。情况果然如此。它的出版,立刻引起了丘吉尔的极大兴趣,英国女王也马上派人买书。

这本书,很敏感。冷战时期,英美夸,苏联骂,骂和夸,都是拿它当“反共宣言”。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英国人改编,美国中央情报局掏钱,拍成动画片《动物农场》,故事的结尾被篡改:“人猪大团圆”,人去掉,光剩猪,完全变味儿。冷战氛围下的阅读趣味,决定了奥威尔的命运。他是被保守主义捧起来的。

苏联和前东欧,还有咱们中国,大家初读此书,都很震撼。很多人都问自己:他怎么比我们还理解我们。正因为有强烈共鸣,读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读者更容易相信,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右翼作品。

但他们读错了,不管有意无意,他们只是读出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奥威尔想说的东西。

## 一、奥威尔是左翼

欲知民主，先知左右。传统意义上的右翼是西方议会中的保守派，左翼是西方议会中的民主派和激进派。右翼多半和遗老遗少、王公贵族和宗教势力有关，而左翼则代表新兴势力，如各种民主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夹处激进、保守之间，往往是中间派。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极右翼，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是极左翼。这是大致的划分，情况经常变。现在，左右两翼不断分化，有所谓新左新右。很多玩经济、玩选举、玩战争的，都是右翼的变种。很多玩理论、玩环保、玩人权的（还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同性恋等等），都是左翼的变种。现在的左翼，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一盘散沙，经常往右转。

奥威尔的立场是左翼民主派的社会主义，他既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又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英国的保守派，他也反对。

阅读此书，知人论世很重要。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一三——一九五〇）是英国左翼作家。他的特点是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终同情劳苦大众和被压迫民族，对英国式的傲慢与偏见有深刻反省。他既反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可惜，现在的读者只记住了他的最后一反，却忘记了他的初衷：他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才批判斯大林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为被压迫者和受害者说话。

奥威尔是个瘦骨嶙峋，腼腆敏感，喜欢自讨苦吃，喜欢冷眼旁观，为生活写作，为写作生活的人。临死前，他立下遗嘱：死后不要给他写传记。为什么不要？因为他很重视生活体验，也很追求文字完美。既要真，也要美。他的小说，大多取自亲身经历。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过得很糟糕”），绝不想自曝其丑（“自传只有在披露了某些丢脸之事时才可信”）。他追求的真是一种夸张的逼真，既有写实性，又有文学性，亦真亦幻。他宁愿把他的书当自己的传记。

他的早期作品，本身就是自传或半自传性的东西。《缅甸岁月》（一九三四）是取自他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他对英国在印缅地区的统治充满负罪感，因此辞职不干，放弃优厚的薪水，立志当作家。回到英国后，他深入社会底层，当了流浪汉。《巴黎伦敦落魄记》（一九三三）就是写他和流浪汉、乞丐、罪犯、娼妓相处的“赤贫之乐”。《牧师的女儿》（一九三五）和《保持叶兰茂盛》（一九三六）是他在伦敦当中学老师和书店店员时所写，主题是“穷”，大写金钱的压力。最后，他还到英国北部调查煤矿工人的生活，写成《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一九三七）。他在大英帝国治下的殖民地生活过，在英国社会的底层生活过，目睹大萧条下的社会贫困，使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起码在感情上，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的书就是他的传记。这个人很复杂，也很简单。

第一，他不是理论家，只是文学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政治文学家。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宣称自己的文学是纯文学。虽然，在《一九八四》中，他也使用过当下时髦的“做爱解构政治”的手法（“腰部以下的叛逆”），但他绝不把这叫做“纯文学”，像港台的文学评论家那样。通常所谓的“奥威尔风格”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是凭生活经验和直接感受，用最简洁明快的语言说出大实话的人，并不在乎读者的好恶。这种语言很有穿透力，有所谓“窗玻璃”之誉。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产党员。左翼派别很多，大致有三种：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人说他是托派分子，不对；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对。他是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要说接近，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支持者，是接近工党立场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左翼走红，入党很时髦。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多少大学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纷纷加入共产党。共产党是左翼中流，但左翼不等于共产党。他对追随苏共的左翼，总是冷嘲热讽，是个非常孤立的人。

第三,他只活了四十六岁,生当二十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一九五一年,他就走了。他是个前冷战时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战,他只看到个头。但他预言了冷战时期。他的影响,生前不如身后。当时的右翼,有普通右翼(如英国的保守党)和极右翼(如德、意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他不属于这个阵营。他骂苏联,是骂苏联变质,勾结英国保守党,跟德国和日本示好,背叛本国革命、出卖他国革命(如出卖西班牙革命),不是骂社会主义。

他是左翼,不是右翼,这点毫无疑问。

## 二、当左翼,不容易

奥威尔的书,是左翼批左翼。左翼批左翼,右翼当然高兴。但他毕竟是左翼。

革命是件高尚的事,也是件残酷的事。鲁迅译过《毁灭》。他早就讲过,革命都是沾血带污。

当左翼,不容易。穷人,没钱,没文化,没有军事训练和政治经验,相当激进,相当暴烈,不怕凶,就怕穷。左翼知识分子相反,最怕最怕,是个人不自由,还有破坏文化(海涅和杰克·伦敦都有这种恐惧)。他们和穷人闹革命,难免格格不入。这是左翼的最大困惑。

历史上的造反起义,经常都是腹背受敌,前怕狼,后怕虎,“杀敌一千,自杀三千”,很多人都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参加革命,这也是考验。

奥威尔曾向往革命,但革命对他很遥远。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远离欧洲大陆,远离真正的革命,要想体会革命,难。

但奥威尔的时代,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整个欧洲,到处充满火药味。他还是体验过革命。

西班牙内战是二次大战的序幕,也是欧洲各派政治势力殊死搏斗的缩影。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死了五十多万人。这是二次大战的彩排。右翼背后有德、意法西斯,左翼背后有苏联,英、美看热闹。这场战争,不仅包括左右翼之间的斗争,也包括左翼内部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参加了）。他本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革命被革命出卖，自己人杀自己人，输掉了这场战争。

当时的左翼，主流是苏共支持的共和派。他想加入国际纵队的正规军，被拒绝，因而参加马统工党（POUM）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可怜的奥威尔，他吃过法西斯的枪子，却被当做托派同情者，被苏共下令追杀。为了讨好英、美，马统工党被苏共取缔和追杀。他的很多战友被关被杀，自己是死里逃生。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九三八）就是写这一段。

他目睹了左翼杀左翼的残酷场面，体会了自己人背后开枪的滋味。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创伤。他没到过苏联，但体会过自己人杀自己人。

我们的前辈，有类似经历。

一九六六年冬，在大别山区，有位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跟我讲过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我还记得，他是坐在一间黑咕隆咚的老屋中，烧树墩取暖，满屋都是烟，什么都看不清。我第一次听说，那么多的革命者都是死在革命的刀下。

这两年，我到湖北监利县和洪湖市跑过，调查湘鄂西苏区的四次肃反。我到过当年杀害红军将士的地点，参观过当地的博物馆。展馆中陈放着地下出土的遗物：纽扣、绳索、手铐和银元。那里有长长的烈士名单：段德昌、段玉林、王鹤、王一鸣、孙德清、旷继勋、柳直荀、李剑如……红六军和红三军的将领，几乎所有，全被夏曦他们杀掉了（旷继勋是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

在洪湖市的瞿家湾，我看到了段德昌的烈士证。他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却惨死于自己人的手里。证书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字零零零壹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烈士证：

查段德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革命”加在“烈士”前面，二字很沉重。

### 三、革命的悲剧

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奥威尔在摩洛哥养病，写成《上来透口气》。他很压抑，怀念过去（童年时代的英国），不满现在，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对未来充满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是当时的“三国演义”。英美、苏联和德国是世界的三极，就像中国的抗战，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也是三极。三极变两极，都是敌人之中选朋友。这就是政治。

奥威尔的选择是什么？

最初，奥威尔是个和平主义者，不希望英、德交战，然而，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反抗纳粹没商量。

战争期间，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东方部工作，服务于英国的战时宣传。这期间，他写过不少评论和随笔。有人说，他的文章比书更漂亮。战争结束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他写了《动物农场》。

这本书，说出了作者最深的忧虑。

奥威尔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但法西斯主义不是出路，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出路。他害怕，德国战败后，左翼风潮席卷欧洲，苏联模式将控制世界。尽管很多左翼人士认为，他不应该在苏军攻克柏林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刻出版此书（此书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德国投降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有战时的媒体管制，他们顾及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也给他施压。但他却说，恰恰是这一时刻，他要警告大家。

作者的寓言，为我们揭露了苏联变质的全过程。

这一过程是围绕着“七戒”的改变。

什么是“七戒”？请看小说第二章：

一曰“凡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二曰“凡用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三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穿衣裳”，四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五曰“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六曰“一切动物都不许

杀害其他动物”，七曰“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头两条，很关键。动物中的傻瓜，背不下这两条，雪球把它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最后，这两条被修正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第十章）。

第三至第五条，动物为了防止部分动物搞特殊化，宁肯拒绝人类的遗产。但奶牛的乳房涨了、树上的苹果熟了怎么办？总得有人吃喝。猪不但霸占了牛奶和苹果，还搬进琼斯的豪宅，睡在琼斯的床上，穿琼斯夫妇留下的衣裳，甚至在留给动物老同志养老的专用牧地上种大麦，准备酿酒，还到人类的农场买酒，自个儿偷着喝。他们把第四条改成“任何动物不许在铺被单的床上睡觉”（第六章），把第五条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过量”（第八章）。

第六条，禁止动物杀害动物，也被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第八章）。

第七条，所有动物平等，也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第十章）。

小说开头，老少校说，人类剥削动物，压迫动物，不合理，动物要翻身，造反是唯一出路。他的说法很合理。

但问题是，他们赶走人类，人类的遗产将如何处置？如果同人决裂，岂不是又回到了畜牲？如果同自己决裂，又由谁来当畜牲（不管本国，还是他国，总得有人当畜牲）？

所以，造反的结果是，只有一部分动物先富起来。革命把猪变成人，其他动物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

读《动物农场》，要看一头一尾，特别是结尾。

小说结尾，动物与人类握手言欢，这是悲剧还是喜剧？

答案很清楚，这是悲剧。

#### 四、奥威尔的恐惧

《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是什么关系？附带说一下。

《一九八四》是《动物农场》的续作。“一九八四”是把一九四八年的“四八”倒过来读，即从我出生那一年，展望三四十年后的情景。他所预言的时代恰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时期，即所谓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欧美是围剿的一方，苏联、中国是被围剿的一方。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联想，觉得这就是早期的《古拉格群岛》。他们更喜欢《一九八四》，以为此书后出，更能代表奥威尔的思想，故事还是讽刺苏联，这个理解并不对。

很多奥威尔的评论家都认为，从文学角度讲，此书不如《动物农场》。奥威尔本人也承认，过度渲染折磨场景，是此书的缺点。

《一九八四》分三部分，从真理部到旧货铺到友爱部，写的是无奈—做爱—出卖。我印象最深是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这章的短歌，非常感伤，掩卷遐思，总是盘旋在心头。

事实上，奥威尔的恐惧是从《动物农场》发端，问题集中在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只是其恐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放大。他的害怕，当然和苏联有关，但故事的场景却不在苏联，而在英国。他害怕的是苏联模式席卷欧美，英国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染上这种病，引起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极权化（即右翼所谓的“赤化”），他的祖国也不能幸免。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采用的不是寓言，而是预言（很多作家都想象过未来的强权社会，如杰克·伦敦的《铁蹄》，奥威尔只是其中之一），恐怖气氛很突出，读起来令人压抑。《动物农场》是写苏联，《一九八四》是写英国和以英国为叙事中心的整个世界。

故事把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年的世界分成三个超级大国——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欧亚国是俄国（苏联）吞并欧洲的结果，范围是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一九八四年时已经存在。与它并存的大洋国是美国吞并英国和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结果，范围是南北美、英伦三岛、大洋洲和南部非洲。东亚国是“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比前两个超级大国要晚十年，范围是中国、日本、蒙古和东南亚。北非、西亚、中

亚和南亚是争夺地带。

这三个国家，都有核武器，拉一派打一派，彼此冲突不断，但并不真打，只是成心折磨这个可怜的世界。这是写什么？这是写冷战。

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是由“英社”（Ingsoc，意思是“英格兰社会主义”）控制的极权国家。它的权力机构下设四个部：真理部管宣传，仁爱部管司法，和平部管军事，富足部管经济。党的口号全是指鹿为马：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这个社会是金字塔结构，顶端坐着的是老大哥（Big Brother，简称BB，不可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下面是核心党，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外围党下面是无产者。

原书说，上等人（核心党）也可能被中等人（外围党）赶走，中等人有可能变成“新的上等人”，但受苦的永远是下等人。作者是站在下等人一边。

他批判大国之间的冷战（“战争即和平”），批判种族歧视、等级特权和不平等（“自由即奴役”），批判用谎言篡改历史（“无知即力量”）。他不相信“党”，无论是核心党，还是外围党，但他相信“未来属于无产者”，“希望在无产者身上”。“无产者”的概念，是他的道义所在——尽管在他死后，英国的“无产者”已经面目全非，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也成了“上等人”，战争与革命，工业与污染，动乱与贫穷，全都送到了落后地区，但“下等人”的概念，还是到处存在。

即使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反对的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痛恨的伪社会主义。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 但是这些年来来的笑容和泪痕 /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

在奥威尔的感伤词句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在全世界各地。

“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来到。可能要等一千年。”

难道我们还没有读出他心中的“社会主义”吗？

奥威尔的预言，有些是对的，比如美、苏称霸的两极世界，还有年代稍晚的东亚崛起（他在世时已略见端倪），但有些并不如此，比如苏联吞并欧洲，英、美成为苏联式的国家。他说，他并不相信，小说中的社会一定会到来；这部小说的地点放在英国，只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不先天优越，同样可能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

大洋国究竟像谁？左翼、右翼有争论，有趣的是，很多左翼都认为，这明明就是自己的国家。更何况，先富的“上等人”欺负后富的“下等人”，还是以富国为源头。

这里有趣的是，故事反复提到“电屏”，也就是老大哥监视整个社会的那个无所不在的设备。这个发明，现在使用很普遍。监视器、摄像头，哪儿哪儿都安——除了厕所（有人甚至提议，特殊情况也可安，比如有人在厕所里交换毒品，经公安部门批准），特别是在“自由世界”，特别是在反恐战争愈演愈烈的现在。

学者多已指出，奥威尔是把他在BBC的工作经历写进了这部小说。他很清楚，战争宣传总是充满谎言（后来的冷战也不例外），他想讲真话。故事中的真理部，原型是什么？很多读者想不到，其实就是BBC的东方部。那是一个蜂窝式的办公场所。BBC的名称本身，也使我联想，它就是老大哥（BB）的公司（C）。

福柯曾把“监视”当做“规训”（社会对人的强制驯化）的一环。老板监视员工，校长监视教员，警察监视犯罪分子嫌疑人，“电屏”很有用。反过来，不可能。反恐提高了“电屏”的地位。

工程，可以用直升机监视。天上还有卫星，可以监视一切。有人吹，卫星可以看见地面上的一张报纸。还有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那时的窃听，也转回来了。对恐怖分子可不可以拷打，也被布什拿出来讨论（其实已经用了，据说“很有用”）。

说起办公室，我会想起托夫勒。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单位组织大家学《第三次浪潮》。老托说，革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变成古董。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技术万能。不但革命不可能，就连足球也将消亡，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全都散伙。当时，有个朋友办了份报纸。我问他，你们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他说，哎呀！你真老土，连这都不知道，人家托夫勒说了，有了电脑，就不用上班。现在怎么样？电脑倒是有了，更得上班。都不上班，老板怎么当？

即使民主社会，民主也不是至高无上。国家，上有上帝，下有老板。老板可以世袭，有如君主。

打卡，格子间加电脑，这是标准的办公场所。

我们是这样“走向未来”（当时有套丛书叫这个名字）。

## 五、创作灵感：小孩和马

一九四七年三月，奥威尔为《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写了个序言。他向俄语读者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讲了此书的创作缘起。

第一，他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于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他是目睹了缅甸的殖民地生活才痛恨帝国主义，目睹了英国北部矿工的困苦无告才拥护社会主义。当时，他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

第二，他说，他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是被苏共当托派分子追杀，很多朋友被关押和枪决，罪名是与法西斯主义者共谋。这一大搜捕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是同时发生，是大清洗的补充。当时，苏共是左翼中流，很多知识分子都相信苏共的谎言，他认为，作为幸存者，他必须揭露这类谎言。

第三，他说，他从没有去过俄罗斯，他对苏联的了解是通过书报的介绍，仅仅是个旁观者。“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

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最后这段话，值得玩味）。

奥威尔说，“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他从西班牙回到英国，一直想用一个小故事来实现这一目的。有一天，在他居住的乡间（沃灵顿），他“看到一个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孩子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很多年前，我也想过这类问题，买过点讲动物的书，想写《畜牲人类学》。我觉得，古今统治术，全靠驯化——人类驯化人类。基于生物学原理的奴隶制和种姓制，并不纯粹是古代的事情。正如共产主义可以回溯到原始社会，整个人类文明也可追溯到奴隶制。从此，人和人的差别，要比人和动物的差别还大。这是真正的分岔口（美洲，晚到十九世纪末才废奴。印度，至今仍有种姓）。

《动物农场》是以动物与人类决裂始，动物与人类和解终。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奥威尔特别指出：“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谐和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马上写的，大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

在奥威尔的笔下，“和解”并不是好词。

二次大战前，苏联为了向英、美示好，宁肯放弃西班牙革命；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曾修好德、日。二次大战后，苏联和英、美瓜分世界，也与它的安全战略有关。

这些都受到奥威尔的谴责，让他觉得，和帝国主义没两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苏联的角度考虑一下，苏联不这么办，又有什么选择？

弱肉强食：强者欺人，不强被人欺，是列强的游戏规则。

不被人欺，也不欺负人，难。

## 六、矛盾的奥威尔

很多左派，都是叶公好龙，既盼望革命又害怕革命，既同情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又害怕他们的愚昧和暴烈。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政治环境，往往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上面说过，奥威尔生活的时代，有三股政治势力，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落实到国家，就是英美、德国和苏联。它们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拆台，握手翻脸随时来。

反对决定立场：有些人，因为苏联发生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宁肯和法西斯主义合作；有些人，因为害怕法西斯主义暴政，也不去谴责苏联的不义。只有奥威尔说，他都反对。

奥威尔的早年，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七年，主要是痛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一九三七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为英国广播电台服务，则是反抗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五年，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他又害怕极权主义会控制世界。

他是个“三反分子”，什么都反。但他所反，互相都反，主要矛盾里面有主要矛盾方面，你到底以哪个为主？毋庸讳言，奥威尔的晚年，他的心病，主要是苏联的极权主义，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吓跑了西方的左翼。

奥威尔辞世前，曾出过一个“黑名单事件”。他有一位女友，西莉娅·佩吉，在英国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处（IRD）工作。这个部门设立于一九四八年，目标是全球性的反苏反共宣传。一九四九年三月，情报研究处派西莉娅看望奥威尔，想请他们写东西或推荐他人写东西。他有

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百三十五个人的名字，包括演员、记者和作家。他向西莉娅提供了其中的三十五个人（其中有卓别林、萧伯纳等人），说明哪些人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或支持者，“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一九九一年这个名单被部分公布，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指责他是告密者，也有人替他辩解，说他只是不同意请这些人写东西，并没有叫当局抓这些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奥威尔的天平毕竟是倾向于英、美，他很难掩饰自己对苏共的恐惧。这是后来左翼纷纷向右转的原因（注意：现在的西方左翼，在很多问题上比右翼还右）。

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的序言中，他把苏联和英国做了对比。他说：

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

奥威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和民主压倒了一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他反对法西斯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他反对极权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自由民主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反教权、反君权的产物，这是西方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苏联抛弃这份遗产，他无法接受。

那么，他又怎样区别于他反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呢？

这才是问题所在。